

【俄罗斯文学】

“人民问题”的初步探索

——论19世纪60年代俄国平民知识分子的理论建构

李 雪

【摘 要】俄国19世纪60年代的平民知识分子,在“人民问题”上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理论建构与创新。平民知识分子以独特的俄国虚无主义为核心动力,将“否定与创造”、“为他人的自我主义”融合为“为人民而不断创造”的奉献精神,一方面创立了知识分子面向人民而进行自我成长教育的“协社”,另一方面则以“土地和自由”为口号设计了“村社”这一构想,将其作为理想社会的发展目标与批判人民苦难现状的武器。由于其道德主义的空想性质,平民知识分子在19世纪60年代的理论建构遭遇了失败,但是它作为对“人民问题”的初步探索,为后来的俄国民粹主义运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平民知识分子;人民问题;协社;村社;虚无主义

【作者简介】李雪,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生,研究方向:俄罗斯文学与思想史(上海 200433)。

【原文出处】《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成都),2019.12.170~175

【基金项目】国家留学基金委资金支持。

在人类社会与文化的发展史上,“知识分子与人民”(intelligentsia and the people)一直是作为知识领域和社会话题的“知识分子”的核心内容之一,而俄国知识分子的相关理论探讨与社会实践,是“知识分子与人民”问题真正意义上的开端,19世纪60年代的俄国平民知识分子对此贡献良多,他们秉持着“为他人而创造”的“俄国虚无主义”信条,围绕着对人民问题的关切,通过政论与文学作品,一方面构建知识分子自我教育的协社,另一方面进行了有关“人民教育与福利”的“村社”理论设计。虽然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的理论建构也只是初步的,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这揭开了人民问题真正作为知识分子实践中心的“序幕”。

平民知识分子的群体构成十分复杂,因此他们面对社会拥有相对更多元的视角。“平民知识分子”的俄文词 разночинцы 的本意是“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人”,^①这一群体囊括了社会诸多阶层出身的人,他们的视角能够触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次,因此与民间、与人民的距离更少隔膜。^②与此同时,19世纪

中叶的历史局面推动着拥有多元视角的平民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与人民”的问题进行观察和实践。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大改革”的震荡,让初出茅庐的平民知识分子投入到社会改造的舆论风暴之中。“大改革”的核心——农村、土地与农民问题,他们将理念诉诸实践,面对在这个过程中不可规避的“人民问题”,他们的探索较之前辈知识分子更为深入和全面。19世纪60年代的俄国平民知识分子,为其后三十年的知识分子运动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其理论建构是俄国思想史上经典的“人民问题”的初步探索。

一、为他人(人民)而创造:“六十年代人”的核心动力

众所周知,19世纪60年代的俄国平民知识分子,即“六十年代人”,在思想史上另有一个称呼“虚无主义者”。然而,与一般意义上的虚无主义不同,平民知识分子所秉承的俄国虚无主义具有鲜明的独创性,亦即“为他人而创造”的普世性政治诉求,这种诉求放置于时代背景下,即“为人民而创造”,它是19

世纪60年代平民知识分子的核心动力。

作为俄国革命的根源和俄国知识分子的重要转折点,俄国虚无主义(русский нилизм)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震动。俄国虚无主义是虚无主义众多历史表现形式中的重要分支,拥有鲜明的独创性,正如斯图尔特·拉姆齐·托普金(Stuart Ramsay Tompkins)所言,“虚无主义是一种俄国现象,深深扎根在俄国的生活中”^{[1](P.51)}。平民知识分子的“父辈”、19世纪40年代的贵族知识分子利用圣西门和费希特的哲学将黑格尔激进化,将对黑格尔的关注核心从“世界精神”转向了历史中通过不断否定的矛盾运动得以上升和自我解放的意识^{[2](P.137)},又通过融合费希特“自我”对“非我”的持续征服,共同证明了人的自我意识是历史力量的绝对核心,在理念上实现了“个人通过否定的辩证打倒权威”的目的,完成了“不信权威、只推崇自身力量”的虚无主义精神的孕育。19世纪60年代平民知识分子继承了父辈的“自我理念的辩证发展能够超越权威”的理论武器,结合“大改革”中所触及到的诸多社会问题,产生出通过自己的努力实践以影响国家与社会走向的强烈意愿。他们用远胜于父辈知识分子的强大的行动力和功利主义精神,使俄国虚无主义“从理念王国进入到了现实之中”^{[2](P.139)}。平民知识分子的虚无主义拥有“否定”与“创造”、“自我主义”与“他人福祉”的双重背反,因而它的突出特点,即是强调“为他人而创造”,这也是平民知识分子关注土地与人民问题的精神之根。平民知识分子在否定的、内向于自我主义的面貌下蕴藏着创造性的、面向他人与社会的道德愿望与政治诉求。通过对当时文学作品中所描绘的虚无主义者形象进行提炼和升华,19世纪60年代的平民知识分子将否定辩证法的创造精神发挥到了极致;而他们在否定——创造的过程中极端推崇“自我主义”与个人力量的最终目的是追寻使人民获得幸福的可能性。

首先,平民知识分子在思维方式和行事准则上继承并改造了黑格尔的否定辩证法,即在不断否定的矛盾进程中对现实进行扬弃,进而进行创造。在面对一切事物时,平民知识分子首先持有的都是倾向于否定的怀疑态度,而他尤其不相信社会文化中久已有之的定见和原则。在《父与子》中,尼古拉·彼

得罗维奇形容巴扎罗夫是“什么都不承认的人”^{[3](P.227)},同时也是“不服从任何权威的人,他不跟着旁人信仰任何原则,不管这个原则是怎样被人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3](P.228)}。巴扎罗夫以德国人为师,却又不尽信他们;他以学习科学技术为毕生奋斗目标,却不承认关于科学的本体论研究。至于面对巴威尔·彼得罗维奇“纸上谈兵”的所谓“历史的逻辑”和“原则与法则”时,巴扎罗夫则毫不客气地指出,逻辑理论并不能帮助人填饱肚子,而世界的法则根本就是莫须有的^{[3](P.261)},他不信奉任何原则,他行动的依据只在于否认。“‘凡是我们认为有用的事,我们就依据它行动’,巴扎罗夫说。‘目前最有用就是否定——我们便否认’。”^{[3](P.262)}

尽管如此,平民知识分子的否定也不是“什么也不用做”的内倾性的消极行为,而是将“否定”变为了用以前进的方法和驱力。在强调“否定”的同时,巴扎罗夫也承认,否定并非是为了什么都不做,也并非只是为了否定而否定:他否定的是毫无实际用处的事物,如名不副实的空话、软绵绵的艺术与拖绊人脚步的爱情,而只对产生实际好处的事情用心,如为了了解人体结构和治愈疾病而解剖青蛙,为了果腹而种地,等等。范求理认为,虚无主义“什么都不相信”、甚至也不相信有“什么都不相信”原则的特质并不适合形容19世纪60年代的平民知识分子,因为“‘虚无主义者’比其他任何人都相信——盲目而激烈的相信——他们自己的理念”^{[4](P.326)}。“虚无主义者准则和意向上的积极因素要比消极因素多得多。如果虚无主义者以破坏性的批判开始,那么这只是让他们得以将自己裹挟着更大热情与更炽烈信念的规则和教义投入到他们学说的每一个部分。”^{[2](P.140)}

因此,内倾性的消极只是平民知识分子的表面,在这表面之下是积极的、创造性的力量。巴扎罗夫解剖青蛙是为了在医学上有所精进;他鄙视普希金和莎士比亚,是为了推崇物理学著作,因为他认为物理学对技术有用;而最后他因耽于医治而死于传染性伤寒,同样是在解剖病人尸体时划伤双手所致,他以生命为代价,换取了关于疾病认识的第一手知识,这是巴扎罗夫精神的极致。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平民知识分子的否定,不是静止的抽象原则,不是最终

的目的,而是在时间中不断向前的、将陈旧的、非功利主义的事物不断抛到身后的经验主义手段。

平民知识分子以否定为扬弃的手段,进而进行创造。他们在否定——创造的过程中持有一种“自我主义”的精神,只相信自己的判断、自己的力量和自己的信念。然而这种创造中的“自我主义”,并非是为了自我封神,而是为他人、为社会的幸福与发展切实作出贡献。

在否定——创造的背反中信奉个人力量的“自我主义”,是俄国虚无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他们对自我进行身份确认的基本原则。在阅读《父与子》的过程中,读者或许会对巴扎罗夫那种颇带几分顽固甚至甘愿为之献出生命的自我期许感到无可奈何,但当看到巴扎罗夫质问“我为什么要依靠时代?还不如让时代来依靠我”^[3](P.241)]时,仍会对其中所散发出的精神产生敬畏。毕竟19世纪中叶的俄国正处在内外交困的艰难转型期,阶层的流动范围甚至比彼得大帝时期更加广阔,对于巴扎罗夫这样出身于农村的寒门子弟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深渊。没有财富与政治背景的平民知识分子,难免会在时代的洪流中有漂泊无依之感,但强悍如巴扎罗夫,却克服了这样的恐惧,他宣布,他们与时代的关系,是改变与被改变的舵手与航船的关系。皮萨列夫精准地抓住了巴扎罗夫依靠自身努力的、近乎偏执的“自我主义”,他说:“他(巴扎罗夫)不承认除了自己、脱离开自我的、不在自我内部的任何支配、任何道德法则和任何思想”^[5](P.235)]。这种自我主义排斥一切软化和规劝。如若没有坚定的信念做支撑,这样的姿态很快便会被外部的困难所击垮。于是,皮萨列夫借对《父与子》的正面解读,在年轻一代知识分子中意图呼吁并建立起一种精英式的“巴扎罗夫主义”,拥有强大意志和能力的、不倚靠同情与帮扶的、以否定为创造性的工具的虚无主义者,是改变世界的中坚力量。如巴扎罗夫一般的虚无主义者的强悍,来源于其自信与自傲,“他相信他自己是真正自主的、自我创造的存在……小说中的每个人都确信他能成为任何他想成为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费希特式的‘自我’,不断地力争让‘非我’服从自己,虽然常常失败”^[2](P.152)]。“俄国只能被知识精英改变……然而,

这样一位精英,只能在对现存秩序的普遍否定中诞生……只有强者能承受此种毁坏……”^[2](P.143)]

因此,虚无主义者平民知识分子的自我主义虽是面向自我的,而其行动目的却是面向社会和人民的福祉,从而改变俄国的现状。无论是有着超越性意义的“让时代来依靠我”的豪言壮语,还是在日常的实践中每一次技术的改良,都是推动着社会向前进步的动力,都面向着一种消弭人民痛苦、改善人民困境的理想。这是一种巴扎罗夫式的浪漫主义,不是耽于沉思,也不是安于理念,而是“将现实转化为理想,在真实中落实合理性”^[2](P.150)]。这种理想与大改革时期的俄国现实相结合,成为了一种具有强烈道德意向的行为准则。

二、协社中的“新人”:面向人民的自我教育

直面人民生存现状的行动让平民知识分子否定性的破坏力量与开拓性的自我主义强力找到了突破口,他们开始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构建汲取了空想社会主义养分的“工场”,或称“互助社”以及“协社”,以期从自身的组织开始将平等、自由与博爱的思想逐渐散布到国家的各个角落。而协社的封闭性质,则表明平民知识分子的此类构建,是他们面向人民的一种自我教育。

有关“协社”的设想来自车尔尼雪夫斯基,它的运转主要依据所得即所劳、每人所得即劳动价值总数除以劳动人数的平均主义。根据思想史与文学方面的相关描述,每一个“协社”都是一个封闭的、内循环的时空体,它的思想根源更大程度上是扎根于道德追求,而非扎根于科学预测与设计。依托于道德主义的“协社”因而深刻影响了平民知识分子在此之后对于知识分子组织以及人民组织的认识,并体现在他们的实践之中。“协社”的雏形最早出现在车尔尼雪夫斯基1859年的一篇书评《资本和劳动》里。在这篇文章中,车尔尼雪夫斯基反对资本主义劳动生产中劳动者所得报酬与其劳动产品不等值的现实,而提倡一种“日常所需与劳动所得均等、劳动者个人所得等于所有人所得除以劳动者人数”的平均主义价值分配方式,亦即“所有主和工作者身份的完全统一”^[6](P.315)]。劳动者依据这一原则,与其他劳动者进行联合,进行独立自由、同时互相协作的劳动。在协社

中,劳动者可以获得与自己劳动价值等价的报酬,同时,劳动所获得的利润,将被投入到公共的食品、住宅、医疗以及文娱活动等生活必需项目的建设之中。^{[6](P.362)}小说《怎么办?》正是对这种协社劳动的文学化表述,不仅如此,车尔尼雪夫斯基通过细节描写,使协社的运作机制更加具体和完整。读者可以通过书中女主角韦拉·帕夫洛夫娜的女友波洛佐娃的视角,对韦拉·帕夫洛夫娜所建立的缝纫工场进行空间游历。

在理想的协社中,平民知识分子彻底摆脱了仍留存于巴扎罗夫身上的“人性的挣扎与犹疑”,而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即“新人”。车尔尼雪夫斯基所开创的“协社”传统,乃是平民知识分子成长教育的途径。但由于协社的封闭性质所导致的失败实践,这种成长教育的根本动力虽然是为人民谋福祉,但是它不属于人民,而更大程度上面对的是知识分子群体自身。

平民知识分子在建造协社的过程中成为了“新人”。韦拉·帕夫洛夫娜的一系列梦境,与梦境之外的现实经历,也是对理想的“新人”知识分子成长教育之路的描摹,并直接成为一代平民知识分子的努力方向。韦拉在梦中走出地下室,和无数与她命运相似的人结为友伴,而在现实中,她脱离了奄奄一息的、牢笼一般的原生家庭,这是她觉醒的第一步;随后,她在梦中看到了平行世界中没有反抗家庭、最终与之同流合污的自己,并感到惊骇,而在现实中,她渐渐认识到自己以前所在环境使人怠惰、使人无望的邪恶本质,并对真善美产生了极度的渴求;在梦中,她见到了未来理想世界的模样与知识分子的“未婚妻”们——那终将实现的世界大同,而现实中,韦拉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互助式的缝纫工场逐渐臻于完美,初步建成了平民知识分子所梦想的平等、自由而快乐的理想共同体。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小说中所描摹的那位吃生肉、睡钉板,事事从最实用的角度出发,实践雷厉风行的神秘的拉赫梅托夫,即是与韦拉·帕夫洛夫娜的对位人物。虽然从艺术技巧上而言,拉赫梅托夫的突然出现显得有些突兀,但他的存在之于韦拉是参照、也是目标。唯有从原先的荒谬

境地中脱身,唯有认识到自己身上难以洗去的劣习,唯有在参与构建美好愿景的过程中不断汲取全新的、健康的能量,才能成为真正果决的、如拉赫梅托夫那样的“理性的自我主义者”^{[7](P.75)},从而以速度和力量达到创造性的、为他人福利而不断奋进的目的。拉赫梅托夫是站在成长教育终点的“新人”,而千千万万如韦拉·帕夫洛夫娜这样的有志青年,正追逐着这一光源,向没有病痛和贫穷、有着高大宫殿与美丽风景的那个世界奔去。

“协社”与“新人”所构筑的知识分子的成长教育之路,达到了超出文学之外的、社会与历史层面的效果,为平民知识分子提供了为他人福利而创造的新思路。在1860年代的俄国,在改革的十字路口,这样的设计是充满希望的呼告。“拉赫梅托夫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通过严格的肉体与精神管理,达到了人类发展的一个非凡阶段。毫无疑问,这是他对1860年代与1870年代热切的青年人有吸引力的重要原因。借助科学与纪律,任何事都变得有可能,并且迅速。”^{[7](P.75)}可以说,“《怎么办?》塑造了整整一代民粹主义大学生与革命者。它成为了年轻知识分子的生活蓝图。尽管它形式上是小说,但它事实上详细叙述了他们(年轻一代知识分子)的出身历史,他们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的年岁中的兴起;他们的道德与个人问题和他们对被限制在只有琐碎利益的不文明社会中的厌恶;他们的热情和他们通过无情的、自相矛盾的决定而完成的性格塑造;他们在创造一个意图囊括个人自由与为人民做贡献的不同的生活。这本书就是为了这年轻的一代而写成的”^{[14](P.178-179)}。

当人民的福祉变得有可能在自己手中实现时,19世纪60年代的平民知识分子们迅速开始了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式协社的模仿,诸多知识分子小组在这一时期建立。但是正如上文所述协社的封闭乌托邦性质,有关“人民福祉”的思考尚未有详细的论证和实践。平民知识分子的相关尝试遭遇了失败,他们的实践,更多的是面向人民的自我成长与自我教育。体验是实践和推广的第一步,平民知识分子们生活在一起,怀揣对人民与社会福利的热情想象,用共同劳动的方式践行着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若干章

程,一时之间俄国涌现出诸多类似的知识分子组织,其中最著名的是“伊舒金”小组。“《怎么办?》早已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最有名的作品;而伊舒金就是其中所囊括的革命者们的第一个典型。”^{[4](P.331)}伊舒金小组的成员追随车尔尼雪夫斯基,建立缝纫和编织工场,其组织规章和原则几乎完全参照《怎么办?》中韦拉·帕夫洛夫娜的工场进行制定,但是,与小说中工场的蒸蒸日上不同,伊舒金小组的工场难见其成,且不说将协社的理念推广到人民之中去,只是小组自己的工场就难以为继。“这种劳动组合在经济效益上并不好,……但这些伊舒金成员并不把这种物质上的窘境挂在心上,因为在她们看来,同志们建立的是一个社会主义的生活基地。”^{[8](P.110)}在小组的平民知识分子看来,公平的理念远远高于工场协社的效益以及其所能造成的实际影响,这就已经决定了其“语词大于行动”、脱离现实和人民的本质,因而其后伊舒金小组因工场的倒闭而剑走偏锋刺杀沙皇并最终失败,也就可以预见了。

三、作为武器和目标的村社:“土地与自由”的呼吁

平民知识分子在协社中的自我教育成长,虽是面向人民福利与解放的,但是并未带动社会以及人民一同成长,因而,他们需要更为广阔的理论平台,来面对俄国人民所遇到的一切问题。“村社”(мировщина)概念是平民知识分子诸多有关俄国农村,如“土地”、“人民”等思想的根本。它兼具“手段”与“目的”的双重性,既是平民知识分子将“古老制度”概念化为“当代利器”,借以解决盘根错节的俄国农村现实问题的工具,同时也是知识分子们心目中未来完美世界的最终形态。

“村社”是俄国农村历史悠久的基层自治组织,在精神层面的世界观和物质层面的劳动方式上,“村社”之于俄国人民而言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村社的俄语名 мир 具有“宇宙”、“世界”、“和睦”的意义,而 община 又同时具有一般意义即“团体”。村社自古以来一直是权力的毛细血管的最末端,它是一张细密的网,网罗了包括俄国农村与农民的劳动组织分配、地方自治统治、人与人之间的精神连结等日常生产生活中的诸多细枝末节,它使用地主制统治与农

民宗族家长制半自治相结合的方式和“连环保”的征税手段,有在一定限度内独立的司法权、分配土地权与维持稳定的作用,这一严密的组织从封建割据时期的诺夫哥罗德公国开始,一直存在于俄国广袤的土地上。^[9]村社虽在漫长的发展中衍生出了诸多变体,但其基本精神一直保留在俄国的传统中。

在19世纪,“村社”经由俄国知识分子的“再创造”而获得了全新的“当代性”,成为了知识分子批判俄国现实并展望未来的核心。19世纪40年代,斯拉夫派知识分子在与西欧派知识分子的论争中,最终将“村社”变为了批判俄国沙皇统治的工具和为俄国人民谋福祉的发展目标。“子辈”平民知识分子继承了“父辈”贵族知识分子在村社思想上的遗产,并又一次对其进行了创造性解读,村社以及其所引起的对土地与人民问题的大规模关注,因此成为了自19世纪60年代起的潮流。与“协社”相似,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改造赫尔岑的“村社社会主义”的同时,仍旧借助了傅立叶主义,赋予了村社以完全不同于斯拉夫派的科学与理性色彩。他所看重和提倡的,因而而是村社成员之间互助协作、按需分配的土地公有制的经济形态。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对反对公社[®]所有制的哲学偏见的批判》一文中,明确表示“关于公社问题随着改变乡村关系问题的开始而获得了实际的重要性”^{[16](P.92)},而村社的重要性在于它并非是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起点,而是终点。村社的土地公有制既是开始,也是圆满的结局,其中间过程则包含了土地私有制的一切发展形态。但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也强调,由于俄国之外的先进民族,如西欧,其土地私有制已经发展到了较为高级的阶段,它影响了其他不那么发达的民族,因而在这些民族,如俄国那里,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就可以越过西欧经历过的大部分发展环节,而直接进入到了公有制阶段,即村社的经济形态。^{[16](P.124)}我们需要注意到,车氏的这一结论中隐含一种逻辑,即俄国有条件可以不必经历残酷的土地私有制剥削阶段,但由于克里米亚战争后俄国已经初步进入资本主义高速发展阶段,因而,如果想要快速达到村社的土地公有制,免除人民被压榨土地之苦,必须借助外力,而不能“顺其自然”。这

些外力是来自西欧的思想财富,也是来自俄国内部改革乃至革命的力量。由此,“村社”在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19世纪60年代虚无主义平民知识分子那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清晰的批判力和范式革新。

在贵族知识分子眼中,建立理想村社的手段并不清晰,而到了19世纪60年代,现实的残酷并不容许平民知识分子有任何犹豫,他们必须选择激进的手段,也就是呼吁人民需要“土地与自由”。车尔尼雪夫斯基那篇论述村社土地公有制的著名文章《对反对公社所有制的哲学偏见的批判》发表于1858年。正如一般所认为的那样,这篇文章发表时,俄国社会对农奴制改革的讨论正热火朝天^{[6](P.681)}。但是,总体而言,由于沙皇政府对针对改革的舆论场表现出较尼古拉一世时期更为开明的兼容并包态度,因而,即便是设立了较高社会目标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农奴制改革以前也坚持的是温和渐进发展到村社土地公有制,主张村社的有效运转必须以自由和良好的协作意愿为前提^{[4](P.151)}。最终,1861年农奴制改革到来了,一切都证明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改革之前的伦敦之行中劝告赫尔岑勿对亚历山大二世抱有过高期望的预感是准确的。众所周知,农奴制改革之后,彼得大帝以来对农村日益收紧的苛政并未被取消,农民们仍旧需要支付人头税,并在地方自治委员会中受到地主和贵族的压制。^{[10](P.345)}对此,激进派知识分子在大失所望之余,亦开始反思,在改革最初的探讨和制定进程中,是否会因为政策的不彻底、立场的妥协以及对人民、对民间了解的不足,而导致改革最终走进死路。

最终,平民知识分子根据改革的实际状况,将批判的目标再一次集中于国家和政府对人民个人权利的剥削之上,他们根据“土地”与“自由”两大主要纲领进行结社,制定了详细的宣传与鼓动革命的计划。虽然19世纪60年代的“土地与自由”社失败了,但是“土地与自由”的口号却自此成为了平民知识分子的主要诉求。在1861年6月1日第102期的《钟声》杂志中,奥加廖夫一篇文章的标题直接便是一句质询:“人民需要什么?(Что нужно народу?)”随后

他在文章的首句斩钉截铁地回答:“毫无疑问,人民需要土地与自由。(Очень просто, народу нужно земля да воля.)”^{[11](P.853)}这篇文采斐然、华丽雄辩的檄文剧烈地抨击了新的土地政策中有关赎买土地的部分,并指出,如果想要使人民得到土地与自由,则必须保证农民被解放的同时得到足够维持生计的土地,并且设置公用的、所有人都可使用并必须为之纳税的土地,同时,严格限制沙皇政府的权力,让人民摆脱官僚的压制,实现村社内部的自治。^{[11](P.854-855)}总而言之,奥加廖夫的纲领仍然以“村社”的理想境地为核心,但其激烈程度和煽动性却比农奴制改革以前俄国知识界有关村社的论述要高出许多倍。在19世纪60年代激进知识分子看来,统治阶层的保守和贪婪使得温和渐进实现村社制度的手段变得不再可能。于是,具有革命组织性质的“土地与自由”社(земля и воля)借助奥加廖夫的这篇纲领性文章,于1861年底建立了。这一时期的“土地与自由”社,前期以宣传平民知识分子有关土地与人民的政策方针为主,而在后期,则意图串联波兰、立陶宛和基辅的起义,扩大农民起义的阵势,造成摧枯拉朽的局面,迫使沙皇政府低头接受以“村社”为核心的土地纲领。然而这一“起义——革命——改革”的计划未能如愿实现^{[8](P.106-109)}。正如范求理所言,“土地与自由社”是“自十二月党人起义以来第一次传播广泛的组织”^{[14](P.261)},虽然它面临瓦解的命运,但是它的建立尤其是它的宗旨,深刻影响了其后平民知识分子的大规模运动。“土地与自由”因此成为了平民知识分子为拯救人民而孜孜以求的两大目标。

结语

在“为他人而创造”的精神动力推动下,无论是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教育的协社,还是作为目的和手段的村社,都是俄国知识分子关于“人民问题”的初步探索。诚然,我们必须看到,与协社作为人类劳动的理想组织必须要求理想的生产环境、生产力以及劳动者相类似,村社作为土地所有制的最高发展阶段,其团结互助、土地公有的劳动与分配方式必须建立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与之相匹配的基础之上。而19世纪中叶刚刚战败、处于十字路口的俄国,其薄弱的

生产力根本无力负担这些完美的制度。协社与村社与其说是关于经济发展的指导,毋宁说是知识分子没有参考实际环境而制定详细的计划与步骤而树立的看似虚无缥缈的空幻许诺。村社思想在《北极星》、《现代人》等杂志中大放异彩,但事实上连车尔尼雪夫斯基这样富有理论原创性的知识分子,都“与农民素无来往”^{[4](P.168)},甚至在当时,许多平民知识分子对19世纪俄国农村土地具体运作状况与人民在村社中的生存现状信息,都是从一个叫做哈克斯豪森的德国人在俄国所作的田野调查那里获取的。平民知识分子只能就村社的制度构想,撰写鼓动农民暴动与革命的宣传册。没有进入到民间而只停留在平民知识分子书斋中的有关人民问题的解决方法,终究是不合适的。因而,在历史的洪流中,19世纪60年代平民知识分子的一系列尝试最终都失败了,伊舒金小组最终被迫解散,而“土地与自由社”则在当局的重压下不得不停止活动,但是,这些看似在短期内没有成效的平民知识分子实践,为往后二十多年的知识分子运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世纪60年代平民知识分子的理论构建,成为了著名的俄国民粹派运动的理论基石和信条。

注释:

①概念 *разночинцы* 的诞生及其在获得“平民知识分子”这一意义之前的尴尬地位,皆源自于彼得大帝改革所带来的俄国社会结构变化。彼得大帝引进西欧制度,莫斯科公国之前沿袭几个世纪的旧宗法制被逐渐改造,在新旧制度的过渡和交割之间,原有的社会阶层划分方式和彼得大帝治下新的划分方式并存、交融并冲突,再加上俄国海陆国际贸易的兴盛、少数民族的不断融入和军功贵族制度被大力鼓励和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不再适合被框定于原有的阶层框架中,“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人”最终成为了俄国法律典籍中一个特定的阶层,拥有了官方含义。同时,在社会文化生活中, *разночинцы* 亦被用于指代那些来历不明、遭人侧目的人,譬如屠格涅夫在《前夜》中,就借女主角叶琳娜的父亲之口,称呼保加利亚革命者英沙罗夫为 *разночинцы* (中译本为“没来没由的东西”)。19世纪70年代,激进知识分子尼古拉·米哈伊洛夫斯基第一次用 *разночинцы* 来称呼那些出身于非贵族阶层的知识分子,“平民知识分子”这一固定所指方才真正确立下来。关于 *разночинцы* 这一词汇的发展史,具体可参见 Elise

Kimerling Wirschafter, *Structures of Society: Imperial Russia's "People of Various Ranks"* (DeKalb, Illinois: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94), 和 Санникий Б. Кто такие разноинцы? // Вопросы литературы. 1977。

②我认为,对指代知识分子的 *разночинцы* 一词较为合适的翻译,除直接从俄文转写为英文的 *Raznochintsy*, 还有 *classless intelligentsia*。这一译法来自巴赫金著作的英文译者卡里尔·爱默生(Caryl Emerson),非常巧妙地展现出了知识分子意义下 *разночинцы* 的多阶级属性,及其在多阶级之下所隐藏的不拘于特定阶级的特点。参见 Mikhail Bakhtin, ed. Caryl Emerson, trans. Caryl Emerson. *Problem of Dostoevsky's Poetic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281。

③这里的“公社”即“村社” *община* 的另一种译法,为保留这一概念本身与俄国农村之间的紧密联系,本文仍将 *община* 译作“村社”,仅在一些引用的译文中保留其不同译法,即“公社”。

参考文献:

- [1] Stuart Samsay Topkins. *The Russian Intelligentsia: Makers of the Revolutionary State*.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57.
- [2] Michael Allen Gillespie. *Nihilism before Nietzsch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 [3] [俄]屠格涅夫.父与子[M].巴金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 [4] Franco Venturi, trans. Francis Haskell. *Roots of Revolution: A History of the Populist and Socialist Movements in Nineteenth Century Russia*. London: George Weidenfeld & Nicolson Ltd, 1960.
- [5] Писарев Д. И.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критика в трех томах: том первый. Ленинград: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е отделение, 1981.
- [6] [俄]车尔尼雪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下)[M].季谦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
- [7] Philip Pomper. *Russian Revolutionary Intelligentsia*. New York: Thomas Y. Crowell Company, 1970.
- [8] 马龙閃,刘建国.俄国民粹主义及其跨世纪影响[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 [9] 金雁.俄国村社文化及其民族特性[J].人文杂志,2006(4).
- [10] [美]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马克·斯坦伯格.俄罗斯史[M].杨烨,卿文辉主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 [11] Огарёв Н. П. Что нужно народу? Колокол. 1 июня 1861 г.(102).